

蘇俄增進人民福利的難題

呂律

壹 俄共在新五年計劃中提出的任務

俄共中央在提出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審議的新五年計劃中認為，「蘇俄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在全力利用科學技術成就，全部社會主義生產的工業發展、提高工業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保證工業進一步的高漲和農業有高度穩定的發展速度，從而獲得人民生活水準實質上的提高，更充分的滿足全體蘇俄人民對於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為完成上述任務，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認為必須做到：「國民收入增加三八—四一%；保證按人口計算的實際收入差不多增加百分之三〇；提高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及集體農民的收入；規定農村與城市居民生活水準接近的措施，以克服城市與鄉村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差別；力求進一步提高人民普通教育和文化技術方面的水準，減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實質上的差別。

布里茲涅夫在代表俄共中央作總結報告、論及「人民物質生活水準的增長和科學與文化的發展」時，對於這一方面會有補充的說明，他說：「在增加產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國民收入的基礎上，今後五年要進一步提高蘇俄人民的生活水準；五年內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收入約增加三〇%」。他進一步說明：「俄共中央認為，提高人民收入的主要方向，是增加工人和職員的貨幣工資，提高集體農民在公有經濟方面的勞動報酬。」並且強調：「工資問題，是一項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關係着億萬人的切身利益，在新五年計劃中間，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每月最低的工資應提高為六〇盧布，而實施此項最低工資的規定，以及提高職工的中級工資，一年需要一二五億盧布，這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他又說：「新五年計劃提出一項任務，要逐漸推行比照國營農場工人按工作種類和工作量的工資水準，

來建立集體農民按月有保障的勞動報酬」。最後他說，「除了工資的調整和增加外，新五年計劃還規定在增加產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下來降低商品的零售價格，逐漸實施一週工作四—五小時的五日工作週制，進一步改善退休金制度——提高工人和職員年老退休金的最低額，將工人和職員退休的條件適用於集體農民，提高集體農民退休金的最低額，改善工人和全體勞動人民臨時喪失勞動能力的保障制度。

柯錫金在報告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時，對於提高蘇俄人民生活物質和文化水準也作了補充說明，他說：俄共中央和蘇俄部長會議在決定新五年計劃發展經濟的主要方向時，特別注意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措施。依照「指示草案」的規定，「消費基金的絕對增長率，亦即用於人民消費方面的物質福利總額，在新五年計劃中將比前一個五年增長七〇%，居民的收入、零售商品流轉額、公共食堂流轉額、對人民日常生活服務額的發展速度，都比一九六一—一九六五年所規定的為更高」。他解釋，「在今後五年內，勞動報酬的增加、工作人員勞動條件和日常生活的改善，將依靠兩個來源：依靠集中在國家手裏的物資，還依靠愈來愈大的將要留在企業中作為物質鼓勵基金和社會每月平均的工資，在五年內將至少提高二〇%，並且到五年計劃末將達到一一五盧布左右，如果再將依靠社會消費基金所得的給付和優惠計算在內，則按一個工作者計算，一共可大約達到一五五盧布，集體農民由公有經濟方面所得的收入，將平均增加三五—四〇%；五年內，整個工人、職員和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基金，將大約增長四〇%」。據柯錫金報告，今後五年，除增加工資外，還規定取消和降低某些部門工人和職員的工資稅。柯錫金認為，目前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是住宅，五年內除建築住宅的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予以提高外，還要廣泛利用各企業的社會、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設基金，如此

，到一九七〇年時大約可使六、五〇〇萬人改善其居住條件和遷入新居。

以上所述，雖然不是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蘇俄黨政首長關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進人民福利計劃和說明的全部，祇不過提綱挈領的搞了一些要點作為本文的論據，但是就從這簡而不能再簡的要點裏，已可體會到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這個問題之所以值得注意，倒不是人人皆知的一向與飢寒分不開的蘇俄人民生活，從蘇俄黨政向不熱心的地步一躍而居首要，而是俄共為什麼要強調這個問題？它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貳 俄共為什麼強調這個問題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進人民福利這個目標，對於目前的蘇俄來說，已不單純具有國內的意義——是社會秩序安定的因素和經濟發展的刺激因素，同時更具有國際的意義——是優劣、強弱、進步與落伍的標誌。

儘管我們在俄共每一項有關國民經濟、特別是有關人民生活的文告和言論中，看厭了和聽厭了近於催眠曲那樣一句話——「蘇維埃國家始終不渝的以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水準為目標，更充分的滿足人民對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但是俄共真正認識此項目標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各部門努力的中心課題，還是一九五九年以後的事。

史達林時代，是蘇俄人民在生活方面最黑暗的時代，不祇是人民的福利毫未放在史達林的心上，對於人民的疾苦也熟視無睹。他的理由是，為鞏固蘇維埃政權，為實現工業化，必須束緊腰帶。在他的全集中起碼有兩段這樣典型的言論，註定蘇俄人民要過終其一生要與飢寒分不開的生活：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卅一日，俄共舉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說到「整個國民經濟」時，他說：

「本來可盡量提高工人的工資——不僅可以把它提到戰前的水準，並且把它提到更高一些，但是這種情況會降低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因為在我國的條件下，在缺少外債、缺少貸款等情況下，擴展工業只能依靠積累某些為資助和滋養工業所必需的利潤，但是如果我們過快的提高工資，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就是說不能有比較大量的積累」。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史達林發表「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的演說時說：

「我認為我們有兩個滋養我國工業的主要泉源，第一個是工人，第二個是農民。」他的理由是：「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通常主要是靠掠奪其他國家，靠掠奪殖民地和戰敗國，或者靠借多少帶有奴役性的巨額外債。……我們的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它不能、而且不應當掠奪殖民地，它根本不能、而且不應當掠奪其他國家，所以，這條路對我們來說是行不通的。」在這種情形下還有什麼辦法呢？只有一個辦法，靠內部積累來發展工業，使國家工業化。」但是這種積累的主要泉源何在呢？這就是我已經說過的兩個泉源：第一個是創造價值並且把工業向前推進的工人階級，第二是農民。……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

繼史達林而上台的黑魯曉夫，他在最初幾年雖然像煞有介事在口頭上對於人民福利叫得很響亮，但是在概念上並沒有與史達林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因之在行動上就無所表現。

後來，黑魯曉夫發現，兩個世界的經濟競賽，祇是在一些個別產品的生產量方面，甚至於在按人口平均的產品產量方面比較，即使是蘇俄比較的結果趕上和超過了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假如說蘇俄的人民在這個時候仍在飢寒交迫之中，退一步說，即使已無飢寒之虞，而在人民的實際收入和購買力方面，產品的生產、分配、品質、品質、成本、價格等等方面，仍舊遠遜於人家的話，則這種趕上和超過仍舊缺乏實際的意義。

於是，黑魯曉夫第一步在七年計劃中提出增進人民福利的原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目標，更在一九六一年俄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俄共新綱領中提出，以二十年時間使蘇俄人民的生活水準超過美國，而達世界上最高水準的計劃。

黑魯曉夫此項認識，當然也就是俄共全體的認識；黑魯曉夫此項決定，當然也就是俄共全體的決定。現在，黑魯曉夫雖然已從政治舞台上摔下來，但是他這個認識和決定并不因人而異，以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為首的俄共領導階層，此次在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中所提的新五年計劃指示草案，仍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目標，其故在此。

叁 俄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

所謂人民生活水準，這是包括許多方面的一個整套的概念，它具有一系列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而且有許許多多指標作為它的特徵，如像：按人口計算的國民收入、實際收入，衣著、鞋類的消費，住宅、文化——生活用品和家庭用品及其他等等保證。

蘇俄雖然在每一個國民經濟計劃上都有關於提高人民物質福利和文化水準的規定，但是，那祇能說是一種具文，甚至於可以說那祇是敷衍而已，其實它截至目前為止，不僅缺乏規劃人民福利的經驗，而且連如何規劃人民福利的理論尚未具備。關於這一點，初聽起來好像是對於蘇俄懷有成見，盲目的或主觀的對它加以批評，其實并不，因為它的經濟體制與外面的世界所行的不同，我們的這一套它不能用，而它自己的一套尚未創造出來，以致發生這樣的結果。

成為蘇俄規劃人民福利困惑的一項問題，是如何安排一個計劃期間「不論是長期的（如五年），還是短期的——一年」積累與消費之間最適當的比例。這個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難以解決的問題，猶如如何最適當的安排國民經濟中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速度及如何最適當的安排工業中甲組工業部門和乙組工業部門發展速度的比例是一樣。——蘇俄直到現在，既無成熟的經驗，甚至於缺乏可資依據的——合乎馬列主義教條和適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

若是從我們的角度上看，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是一切經濟活動努力的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在規劃人民福利時，提高國民收入中的消費比例，在理論上似乎不應該有什麼可以爭論的，不過，這樣一來，對於蘇俄來說，就要妨礙社會主義經濟中工業的發展，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就要使固定資產的增長受到影響，貶低積累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在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中的重要性。

要保持一定的積累比例，像工業中生產資料生產和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速度那樣，要永遠快於消費資料生產和工資的發展速度，則所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進人民福利，即等於是一種口惠，等於欺騙。

蘇俄增進人民福利的難題

這是頗感難以解決的一個問題，同時又是急待得出一個結論的問題。目前蘇俄關於如何最適當的安排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問題，顯然有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意見：

有一派人士認為，在遠景方面可以提高以增加非生產性的積累為條件的積累比例，因為要擴大住宅和文化——生活建設，進一步提高人民福利的速度之故。這些人確信，在蘇俄的國民收入中規定相當高的積累標準，這是經濟發展現階段的特點所決定的，照他們的意見，這樣可以保證經濟發展速度，將有可能佔用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增加就業的可能性），為農業和乙組工業各部門的重新裝備創設條件，保證擴大住宅和文化——生活建設，以及進一步提高國家的國防力量。

另一派人士認為，蘇俄國民收入中有相當高的積累基金比例，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基本建設投資和固定資產利用的效率不佳成正比。他們的意見以為，要實質上提高物質資源和勞動資源的效率，儘可藉實行許多措施以求達到目的，不必藉助於提高積累基金，所以，他們認為國民收入中積累基金的比重應予降低。

蘇俄的黨政最高決策當局最後究竟要站在那一邊呢？根據以往的經驗，如果他們不拿出快刀斬亂麻的魄力來，這個問題可能拖到這個五年計劃終了也不會得到解決，因為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每一個計劃期間都有一些因素成為提高或降低積累百分比的條件，這一次，當然同樣也有這些因素存在，蘇俄的黨政決策當局究竟是放棄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諾言，還是放棄傳統上的錯誤？

我們以為，蘇俄黨政當局既然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增進人民福利相標榜，當然不會直截了當的表示放棄這個或那個，而是在增加實際收入方面兜圈子。根據新五年計劃的一切文件看來，今後蘇俄勞動人民的實際收入，是建築在三個來源上：除了以前的工資收入和來自社會消費基金項下各項優惠收入外，新增一項收入，即企業內部的所謂物質鼓勵基金及社會——文化措施與住宅建設基金。自從去年九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經濟改革案以來，蘇俄黨政當局特別強調新增的一項收入來源，大有新五年計劃關於人民實際收入的規劃，係以這一項來源為主要之概。——他們說，「利潤愈多，工人和職員的收入愈多」，這句話，是大大可玩味的。

何謂物質鼓勵基金及社會—文化措施與住宅建設基金？我們根據俄共中央九月全會以來有關經濟改革一切文件看來，此項基金是建立在一個企業的利潤提成上，而一個企業的活動能够產生利潤的結果，不僅是要完成生產計劃上的產量指標，更重要的還要完成增加品類的指標、提高品質的指標、降低成本的指標、增加新產品的指標、完成銷售計劃的指標、達到計劃上盈利率的指標和利潤的指標，而這些指標能够一一實現，並不是無條件的，它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崇高的責任心、嚴肅的勞動紀律和生產紀律的配合。所以，要形成物質鼓勵基金及社會—文化措施與住宅建設基金，進一步這些基金能使員工和集體農民發生享受到的感受，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

從而我們知道，柯錫金所說，五年內工人和職員每月平均的工資將至少提高二〇%，集體農民由公有經濟方面所得的收入將平均增加三五—四〇%，這其中是有一定的物質鼓勵基金及社會—文化措施與住宅建設基金的比例在內的，這些基金果真能够不折不扣的形成，同時它們的負擔能力也確如蘇俄黨政當局所計算的那樣，當然無話可說；但是，在這些基金的形成和負擔能力不够理想的情況下，新五年計劃對於員工和集體農民的收入的規定（即對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具有決定性的一部份）就要落空，而且根據以往的經驗，這種基金的形成與負擔能力不够理想的可能性非常大，特別是集體農民和國營農場的工人和職員，他們計算一下，在爲了形成此項基金所費的精力比經營個人副業所費的多，而所得的利益又比較少時，他們當然不會拋棄自己的副業而不爲，將精力去用到公有經濟上。

所以，要說俄共能解決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個問題，其可能性并不怎麼大。

肆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最大的一個困難

除了上述一些困難，是使蘇俄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諾言不易實現之外，還有一項最大的困難，使俄共過去和今後均無法實踐此項任務。衆所週知，這個困難就是優先建立國防力量的原則。

俄共新綱領在一一列舉到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〇年時關於人民生活的構

想以後說：「所擬定的綱領，在和平的條件下是可以順利實現的，國際局勢的複雜化和由此而引起的國防費用的必要增加，可能延遲提高人民福利計劃的實現。國際關係的穩定與正常化，軍事費用的縮減，尤其是在各國之間達成有關協定的基礎上全面澈底裁軍的實現，將有可能使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計劃被大大超過」。——此項規定，並不是說在一旦有此可能性時的一種假定，而是指當時、甚至於指一貫要如此下去的事實。

我們知道，蘇俄在一九五八年遇到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豐之年以後，淺薄的黑魯曉夫以爲蘇俄的農業靠新生地已告根本解決，從此再不必憂慮糧食問題和工業上所需要的農業原料問題，可以重行提出解決蘇俄的基本經濟任務——即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產量趕上和超過美國的任務。於是，他毅然決然將行到中途的第六個五年計劃打斷，另起爐灶，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實行一個野心很大的七年計劃，要以這個計劃來實現蘇俄的基本經濟任務，不但要使人民生活水準趕上美國，也要使蘇俄的國防力量（包括核子武器競賽、太空科學競賽等等）趕上美國。

衆所週知，蘇俄的野心儘管大，但是它發展核子武器和太空科學等等的資金是有限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它不得不挪用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資金。於是，爲時不久，就在一九六一年通過新綱領的時候，就使農業、工業部份的乙組工業、與人民生活有關的其他各部門不但無法做到計劃上規定的任務，而且一落千丈。

情形既然如此，論理蘇俄黨政當局應作懸崖勒馬之圖，以免一錯再錯，但是事實告訴我們，直到七年計劃終了，不過祇簽了一個禁試核爆炸條約而已，競賽的計劃和作業并未停止或削減。

黑魯曉夫一九六四年十月戲劇性的下台，并不表示俄共新領導階層要與民更始，因此新五年計劃也并未以七年計劃的失敗爲前車之鑑，照舊揭櫫兩大目標——加強國防威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就註定蘇俄人民在最近五年內已不必再想生活會有巨大的改善。

有人或者會根據一九六六年蘇俄預算，認爲國防支出所增加的并不太大，不致影響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目標，其實，這是錯誤的，其錯在於未深切認識蘇俄軍事預算的結構。

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蘇俄軍事費支出共分爲九大項，即：薪餉、組織

與行政開支、服裝糧秣支出、技術供應、文康教育支出、以及供給國防工業資金等，其下又分爲七九個獨立項目。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軍事費支出共分爲兩類。

從一九四〇年代初期至目前，軍事費支出被列爲國防支出。

蘇俄每年公佈的防衛支出，祇能代表蘇俄軍事費的一部份，也就是說，祇代表國家預算的直接軍事費部份，即火箭部隊、空軍、地面部隊、海軍、防空部隊、各種後勤部隊，以及各種武裝部隊的經費。由國家預算直接支出的幾個方面是：（一）陸、空軍及艦隊編制內武器、彈藥、機械、燃料及滑潤油、口糧、服裝、以及戰備部隊必須的其他物資；（二）供給國防部的基本建設及工業企業資金；（三）武裝部隊單位的軍事要求、政治訓練、營房及康樂設施；（四）武裝部隊軍職人員的薪餉和津貼。其他軍費開支，如國防工業、戰略防禦物資及糧食的儲存，原子研究及退役軍人津貼等，均隱藏於國家預算的其他部份之中。因此，真實的軍費支出遠較每年公佈的蘇俄防衛預算爲高。

蘇俄國家預算內隱藏項目的確實數字無法得知。據說在「國民經濟」項目之下，除農業、交通等基本經濟部門之外，又有一項提供工業資金數字，計包括二個工業部門，其中有四個係屬軍事用途的工業。

蘇俄自實行工業化以來，國防工業即成爲蘇俄經濟最享優先的部份。在全部工業和建設撥款內，國防工業撥款預算的比率繼續增長：一九二二—二四至一九二六—二七年爲一一·二%；一九二七年爲一三·八%（另一項資料爲一八·五%）；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年爲二九%。一九五五—一九六二年工業及建設基金的比率，佔國民經濟總額的四三·二%；一九六三年的數目爲四〇%；一九六四年工業所佔的比率與一九六三年相同，其中有四〇%（即一五五億盧布）爲工業基金，而其中國防工業佔二九%（即四五億盧布）。

國家防禦預備費是一筆特別基金，目前隱藏在國家預算「國民經濟」和「其他未列舉的支出」項目內，過去九來年（一九五五—一九六三年）其他支出款項平均每年爲三九億盧布。

蘇俄的軍事費不能從軍事與非軍事的表面上劃分，而要看對國防有無關係和影響而定。一般或者認爲國家預算上社會—文教和科學的撥款不致爲軍

蘇俄增進人民福利的難題

事費的隱藏所，其實不然。四十年前蘇俄國防部長伏魯茲曾寫道：「在經濟、文化及其他任何新事業中，我們必須問這些事業與保衛國家任務的關係如何，能否爲指定的軍事目的服務而不妨礙其和平的目標？」因此，一九六四年社會及文化教育計劃的撥款（三二八億盧布）內包括有原子能研究及退伍軍人養老金的支出；蘇俄在科學研究方面的全部支出，多少都帶有軍事性質。

一九五〇—一九五七年蘇俄國家預算內未詳列的支出所佔的比例，由一九五〇年的四二·六%增至一九五七年的六〇·四%；設若一九五八—一九六四年的科學撥款，它隱藏的比例與一九五七年相同，則一九五〇—一九六四年軍事研究支出就由一九五〇年的三億盧布增至一九六四年的二二億盧布，增長的幅度爲七倍，這種增長主要用於原子能研究方面。

蘇俄歷年所支付的退伍軍人養老金，也不列於軍事費內，而是包括在其他項目內，這項支出據估計一九六四年爲二〇億盧布。

其他雖無直接軍事性但直接支持長遠軍事政治目的間諜活動費，情報經費，資助各種顛覆活動費，對外軍事、經濟、技術及科學援助費，都隱藏在國家預備的非軍事的項目內。根據蘇俄官方的資料，間諜和情報費用在一九二二—二四年被列爲「非公開支出」，一九二四—二五年被列爲「秘密支出」，一九二五—二六年被列爲「國家統一政治局特別費」，目前用何種名義及其數目若干，則無相當資料可供參考。

除蘇俄國家預算外，工業防禦企業也對軍事性項目提供資金，據估計一九六四年此項隱藏資源撥給國防工業的總額將達三五億盧布，佔工業企業資源（一一九億盧布）的二九%。

蘇俄軍事費的支出結構既如上述，不要說在世局告緊之秋，蘇俄的人民談不到生活水準的提高，即在像今天這樣的局勢下，他們提高生活水準——增進福利的可能性又在那裏呢？

本文重要參考資料

一、蘇俄「經濟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第五十一期，經濟學候補博士 N·布茲良科夫所作「人民福利的規劃」。

二、美國「外交季刊」，一九六四年四月號，T·蘇斯洛夫所作：「蘇俄的軍事預算」。